

解讀博古、毛澤東、周恩來的 三邊關係

——評《博古和毛澤東》(上篇)

● 高 華

經過毛澤東等人長期、有意識的灌輸，和教科書、文學讀物、戲劇影視的反覆濡化，博古早已被符號化，成為和王明一樣的「反面人物」，是「左傾機會主義的頭子」。



秦福銓：《博古和毛澤東——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領袖們》（香港：大風出版社，2009）。

今天的青年人大多不知博古（秦邦憲）何許人也，而五六十歲以上的中老年人對博古的名字一般都耳熟能詳，蓋建國初原來只在黨內高層中傳達的有關王明（陳紹禹）、博古的錯誤被公開化了，原先沒有

點名的兩人在〈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上出現，並收入《毛選》。到了1960年代，全民學《毛選》，人們順帶着也學其中的〈歷史決議〉，於是都知道了王明、博古。文革時期，「兩條路線鬥爭史」大普及，毛澤東、周恩來、康生等，都會在講話中提到王明、博古：博古是反對毛澤東正確路線的「左傾機會主義者」等等。經過他們長期、有意識的灌輸，和教科書、文學讀物、戲劇影視的反覆濡化，博古早已被符號化，成為和王明一樣的「反面人物」，是「左傾機會主義的頭子」。但博古是「四八烈士」之一，又在中共七大上作了「深刻的檢討」，他的名聲就好於王明，最新的圖像符號是前些年播放的「紅色經典」電視劇《長征》，對其定位是「犯了重大錯誤又不失對革命事業忠誠的共產黨員」。

秦福銓在2009年出版的《博古和毛澤東——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領袖們》（引用只註頁碼）對延安整風後形成的，以批判博古等錯誤為中心的中央蘇區史、長征史等歷史定論提出了質疑。作者是博古的

侄兒，依據他從長輩處聽來的「故事」，在一系列重大史實方面提出完全不同的看法。這些看法若能成立，將在一定程度上改寫相關歷史敘述，但是該書不同於一般的回憶錄和歷史著作，特別是它未能引用有關文獻和其他文字材料，作者又是博古後人，這些因素是否會影響到該書內容的客觀性、真實性，是需要細加研判的。

一 對傳統定論的反駁

秦福銓第一次對幾十年來圍繞博古的傳統舊論提出反駁，計有以下十個方面：

(1) 毛在江西的「個人崇拜」

此書首次提出這個問題，例如：羅明等在江西蘇區經常把「領袖毛主席」掛在嘴邊，博古等認為，這是毛放任對他的「個人崇拜」。站在博古和中央的角度，毛在江西的「個人崇拜」確是事實：《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一書引用當事人的材料，說明在當時中央蘇區軍民只知朱德、毛澤東，不知博古、王明，此等情況很容易被博古等認為在中央蘇區，黨的生活不正常，黨員只知個別領導，而不知黨的集體。更早一些，毛任湘贛邊區書記時，黨內對毛有「書記專政」之批評，然而「個人崇拜」一詞是1950年代蘇聯批斯大林後才流傳的，何以在1930年代的中央蘇區就有這個詞？將此詞往前移置江西時期，當是作者和編者所為，那是不恰當的。

從秦書看，毛的實際影響力在長征前一直都是很大的，例如：他

提議撤出中央蘇區進行戰略轉移時，一定要帶上婦女和機器，博古只能同意；他想抓誰就抓誰：季振同、黃仲岳等國民黨起義將領因為對毛有不滿之言，最後被殺；寧都會議後，毛情緒不佳，撻挑子，「小病大養」，中央無可奈何；他又經常散播對中央的流言蜚語，中央只能聽之任之，束手無策。

是甚麼原因造成毛的自大？該書認為，關鍵是臨時中央沒權威。在一段時期內，臨時中央只是上傳下達的辦事機構，特別是在財政上依賴江西蘇區；而且方面軍前委自作主張改變了稅制，加之中央提款員兩次被劫，使得中央的財政非常困難，在中央蘇區那邊就沒了威信。1935年國民黨「中統」出版的《中國共產黨之透視》一書也提到，1931年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後，「第三國際已停止中國黨之津貼，黨之經濟，全賴匪區供給，故留俄派對實力派，又不能不低首下心，此為留俄派全盛時期中之一大缺憾」^①，此恰和秦書形成互證。不過，此說並不準確，1931年後，莫斯科對中共仍有經費支援，只是不像過去那樣定時，才導致臨時中央對江西蘇區的財政依賴性加強，國民黨當時並不知道莫斯科一直斷斷續續資助中共。秦書說，臨時中央權威的建立是在寧都會議停止毛的軍事指揮權之後，共產國際來電明確臨時政治局為臨時中央，情況才改變。

(2) 反「羅明路線」與反「鄧毛謝古」

在傳統黨史中，博古的一個重大錯誤是反「羅明路線」與反「鄧毛謝古」。毛說這是「指雞罵狗」，是針對他的。毛還具體指出，「反鄧毛謝古」，是張聞天寫的文章，羅

毛任湘贛邊區書記時，黨內對毛有「書記專政」之批評，然而「個人崇拜」一詞是1950年代蘇聯批斯大林後才流傳的，何以在1930年代的中央蘇區就有這個詞？

1955年「潘案」發生，毛大怒，周恩來、陳雲都噤若寒蟬。但毛去世後，陳雲為潘漢年的歷史做了重要證明，若無他主持公道，潘的平反不會那麼順利。

邁(李維漢)負責落實。毛說的並不錯，反「羅明路線」確實針對毛，但本書披露事情的起因卻和過去的說法不一樣：第一，羅明一口一個「領袖毛主席」，讓博古聽了氣惱；第二，毛讓前委秘書長古柏領導三個中心縣委，以地方為優先考慮，截留稅款，影響國庫收入。最後，羅明不顧群眾，遇敵就跑，這樣就被認為是「右傾」，並被升格為「羅明路線」，挨了一陣批。其實也多虧這場「鬥爭」歪打正着，原來與毛素無淵源的鄧小平從此就一直被毛認為是自己人，得到毛的重用。

(3) 陳雲在「王明路線」時期的角色

陳雲頗似周恩來，為中共幾個歷史時期的領導人，歷經幾十年風雨而不倒。與周恩來相比，陳雲還多一個優勢，就是「工人」出身，因而長期受莫斯科信任，從1931年9月進入臨時政治局，到整個「王明路線」時期，都是中共主要領導人之一，1935年春還奉命離開長征隊伍，轉道上海前往莫斯科匯報遵義會議，以後留在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工作，一直到1937年11月，才與王明、康生等一同回到延安。

有關陳雲與「王明路線」的關係，陳雲本人倒是頗為坦率，他在毛上台後，特別是1940年代後說過，那個時期中央犯的錯，他都有份。但是這方面的具體材料不存在，一般只能以陳雲在這一時期擔任的幾項工作加以推論。秦書提供了新資料，這就是作為臨時政治局成員，陳雲與博古一道前往蘇區，他與博古等在許多看法上是一致的，例如：他們都同意加強中央權威，反對毛的「個人崇拜」，秦書這一說法應可信。1935年夏，博古的

弟弟楊琳(秦邦禮)與陳雲等同往莫斯科，陳雲到達莫斯科後，與王明等也相處較好(《王明回憶錄》中可見反映)，以後陳雲也沒如康生那樣去控訴王明。1962年夏之後，在毛的「一言堂」下，陳雲以養生為重，避其鋒芒，直到毛去世。作為歷史見證人，他又在關鍵時刻出面說話，例如陳雲和潘漢年是老戰友，1955年「潘案」發生，毛大怒，周恩來、陳雲都噤若寒蟬。但毛去世後，陳雲為潘漢年的歷史做了重要證明，若無他主持公道，潘的平反不會那麼順利。

(4) 長征前夕博古中央想把毛甩下？

舊說博古企圖把毛留下，讓他自生自滅。伍修權在《我的歷程》中寫道：「當初他們還打算連毛澤東同志也不帶走，當時已將他排斥出中央領導核心，被弄到于都去搞調查研究。」《康克清回憶錄》中說，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下達「準備出擊」的命令後，康克清與朱德談到了毛澤東、陳毅是否參加長征的問題。朱對其妻說：「這一次，他們總算讓毛澤東一起走啦。」毛的警衛員吳吉清在《在毛主席身邊的日子裏》也回憶了長征出發時因為中央縱隊編隊名單上沒有毛的名字而領不到物品的具體經過。

但是秦書卻說，是毛主動要求留下：1934年10月初，毛派警衛員胡昌保、吳吉清給博古送來急信，提出他要留在中央蘇區，以及可把中央機關的老、孕、重傷員等一起交給他留下，同時要求把羅炳輝和九軍團的二十師也留下。周恩來專程前往于都勸說毛，大雨中警衛在外守護一夜，周與毛通宵長談，毛才改變主意，同意隨大部隊轉移。

(5) 湘江之戰的失敗責任的問題

舊說湘江大敗，責任全在長征初博古中央帶着瓶瓶罐罐，致使突圍隊伍行動遲緩，此為經典敘述。此說還有重要細節做墊托，1980年代初，聶榮臻的回憶錄問世，提到一關鍵細節：湘江之敗，博古幾乎崩潰，舉槍要自殺，被聶制止，此情節後來還上了電視劇，影響很大。秦書提出：湘江之戰的失敗責任在毛。博古原先的計劃是將機關人員分散到各軍團去，但毛不同意，因為機關人員中有老、女、病、孕，編到大部隊，行走不便，他們也不願分散到老鄉家裏去，有些農戶也不願接受。毛的意見是將他們集中，編成縱隊西征，博古等最後接受了毛的意見。

「兩頂轎子」，專指「紅章縱隊」和「紅星縱隊」。「紅星」是中央機關、軍委機關人員，「紅章」是中央政府工作人員。該書說，博古反對多帶物資，但遭毛反對，毛的意見是「擇要隨行」（頁98）。另外，現在「轎子」一詞還專指毛之長征乃坐轎而行。1980年代，索爾茨伯里（Harrison E. Salisbury）的《長征——聞所未聞的故事》（*The Long March: The Untold Story*）被譯成中文，有「擔架上的陰謀」一節，毛之長征坐轎，才廣被人知。

秦書說，到達湘江之前，發生挑夫罷挑要求發錢回家，不願再西行，博古急電葉劍英，發銀元讓挑夫回，並要求將所有溜重一律拋棄，兩個縱隊合併為一個中央縱隊，不願西行的，可以發回家路費，但此令未得執行，遭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小三人團」抵制。挑夫走了，溜重還得帶上，葉劍英只能讓八軍團的新戰士當挑夫，一天走不

到四十里，兩個縱隊三天只前進100華里，紅九軍團為保護這兩個縱隊，也被拖着走不快，首尾相差160華里，還得派紅五軍團三十四師死守在文市，以致延誤渡江時機，造成湘江之戰的重大失敗。

(6) 遵義會議周扶毛上台與勸退博古

舊說對周恩來在遵義會議之前的準備工作完全不提，此書第一次披露：是周向博古提議開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對大轉移進行一次初步的總結。博古信任周，讓周主持會議，並提出此次會議應糾正「政府比黨大，有禁不止」，在政治局內搞「中央三人組」小宗派的問題。「中央三人組」是指編在「紅章縱隊」的毛、張聞天、王稼祥，「天天聚在一起」，常常不聽中央號令，自行其是（頁105），被認為是在博、周、李德「三人團」之外的「小三人團」。

秦書認為，周恩來對遵義會議起了關鍵作用。首先，周在會議前夕，將跟隨毛上井岡山的「湘東嫡系」紅九軍團二十師調上來，替代1934年9月由項英挑選的忠誠可靠的幹部組成的原中央警衛營，博古認為，「明擺着是武力威脅，不達目的就動武」（頁123），後經周的解釋和寬慰，才使其心結釋然。第二，周臨時改變與博古商定的會議議程，支持張聞天的發言，還通過自我批判，把會議引到對中央的批判。第三，在會後與博古談心，使博古心悅誠服地交出「總書記」一職。

周扶毛上台，難道不知毛的缺點？他在勸博古下台時談到：老毛這個人最大的缺點是領袖欲太強，好猜疑，主觀，聽不進意見。至於「肅反擴大化」，責任在中央，老毛

舊說湘江大敗，責任全在長征初博古中央帶着瓶瓶罐罐，致使突圍隊伍行動遲緩，此為經典敘述。秦書提出：湘江之戰的失敗責任在毛。

只是借風使船，清除異己，以大手筆統一江西各路紅軍。周向博古解釋何以老毛缺點明顯還要推毛出台，乃是為了打敗蔣介石，建立無產階級新政權這個大局(頁128-29)。不久，博古和潘漢年談話，其中就談到博古為甚麼同意重新起用毛：「完全是為了中央紅軍的命運，為了中央政治局的團結。……紅軍需要有一個有獨特軍事才能的人，來幫助中央掌握軍事行動最終決定權的周恩來行使這個權力，……雖然毛澤東有不少缺點，尤其是有濃厚的封建帝王意識，排除異己，心狠手辣，但目前是逐鹿中原，沒有一個曹孟德那樣的人還不行。」(頁140)

(7) 毛何以對徐向前長期不加重用

這在官方論說中不提，但在民間，特別是網絡上，是軍史愛好者長期討論的熱點。秦書明確點出乃是因徐向前不聽毛的勸告，執意隨張國燾南下，毛臨離開前警告徐，勿忘黃仲岳之教訓。以後事實說明，毛是說到做到，在收編了徐部後，徐向前果然坐了幾十年的冷板凳。

(8) 「潘漢年案」的真正原因

「潘案」的解釋多有變化，從舊說「內奸」到1980年代平反，雖知此案與毛有較大干係，但一般都以為是潘私見汪精衛又長期不向組織匯報才致使毛震怒。秦書提出，潘之結怨於毛，乃是潘與博古、王明交厚，深受彼等信任，被委之於擔任國內中央和駐共產國際中國代表團的唯一聯繫人，而潘身帶莫斯科最新編制電訊密碼九個月，卻奉王明命，先與國民黨談判，不先回陝北交密碼，從而不被毛信任。

(9) 季、黃冤案與李特、黃超被秘殺

1931年12月，在江西剿共前線，趙博生、董振堂、季振同、黃仲岳率國民黨第二十六路軍17,000人投奔紅軍，史稱「寧都起義」，隨即成立紅五軍團，以季為軍團總指揮，董副之。趙、董後為中共烈士，事迹廣為人知，但季、黃的史實卻長期被埋沒，兩人直到1980年代才被平反，說是被極左路線殺害了。秦書說，最初毛要調黃的手槍營，黃不同意，毛大怒，以謀反罪要抓季、黃等。本來上海臨時中央已同意黃等去蘇聯學習的請求，但毛擔心他們去上海後會向臨時中央告狀，就下令將幾個人逮捕。季、黃後被公審判處死刑，由於項英堅決反對，才分別改判十年和八年監禁，季、黃被處死應是在長征前的1934年9月，但書中只是模糊說他們「以後」被殺。季、黃被殺的責任，博古予以否認(頁182-83)，而1972年周恩來則在一次會議上承認自己負有責任。

另一樁秘殺案也是在1990年代末才在內部低調平反。李特是西路軍參謀長，黃超是四方面軍第五軍政委，他們在張國燾和毛的爭鬥中支持張，西路軍失敗後，與李先念等轉戰到迪化。秦書說，李、黃聽說王明從蘇聯回國已到迪化，沒和李先念等商量，就前往蘇聯駐迪化領事館要求面見王明，向共產國際告毛的狀。李、黃在領事館被康生截下，幾天後，死於督辦地下室的麻袋裏。康生回延安後向毛匯報此事，受毛賞識(頁169-70)，知道內情的李先念從此噤口不提。

(10) 博古與米夫及蘇區肅反的關係

舊說都認為博古等是米夫(Pavel Mif)親信，蘇區肅反是「王明路線」

秦書明確點出毛對徐向前長期不加重用，乃是因徐不聽毛的勸告，執意隨張國燾南下，毛警告徐勿忘黃仲岳之教訓。以後事實說明，毛是說到做到，在收編了徐部後，徐向前果然坐了幾十年的冷板凳。

的罪惡。在該書的附錄中收入了博古在延安整風期間所寫的〈我要說明的十個問題(提綱)〉，文中交代了他和米夫、王明、張聞天以及周恩來等是工作關係。他說，他和中國黨，甚至聯共都不知道「國際為米夫匪幫所盤踞」(頁179)。博古強調在蘇區肅反時，他「絕沒有任何一次指示要殺任何人」，「絕未使用保衛機關作黨內鬥爭的工具」。針對康生等懷疑博古是奉國民黨命在中共內部進行破壞的指控，博古申明，這是對他的「污蔑」，表示自己是堅決反對國民黨並與它做生死鬥爭的，「主觀上是忠實於黨和無產階級的事業的，絕對沒有一點自覺的破壞黨和革命的企圖」(頁180-83)。從該提綱可看出，米夫被斯大林處決一事成為王明、博古失敗的最重要的外部原因。在高層整風會議上，對博古的批判火藥味極濃，康生和彭真是最重要的炮手。

此書新說舉其大要者十端，其與舊說差別之大，十分令人驚訝。關注中共黨史的人，自會知道秦書這些說法的巨大衝擊性，並且自然會追問：作者所說的是真實的嗎？他有甚麼證據？資料來源可靠嗎？

二 史源的疑問

作者自承此書「先天不足」(頁208)，應該不是自謙，而是事實，加之作者身份特殊，不能不使人對此書的史源和客觀性格外關注。

在筆者看來，此書兼具回憶和研究的雙重性質，但又不完全符合「回憶」與「研究」的基本要求。首先，回憶主體模糊，例如：西路

軍、黃超、李特被殺等部分，是從哪兒聽來的？秦書沒有提供口述者具體回憶的時間、地點。其次，書中一部分內容明顯是吸取了學界研究成果，卻沒有為資料和觀點註以出處。整理者雖然作了說明，似乎可諒，但如此這般將「回憶」與「研究」煮成一鍋，無形中就誤導讀者。例如第七章中「李先念和毛澤東的一次談話」，就是從朱玉主編的《李先念傳：1909-1949》中若干章節摘抄而改寫的^②。以上特點使得該書不同於一般回憶錄，而對於一般讀者或歷史研究者，他們最關心的是作者這種聽來的「故事」有多少可信度？在考證這個關鍵問題之前，首先須了解作者身份及這本書主要內容的來源。

作者是博古的侄兒，其父楊琳是資深中共黨人，1930年代初與陳雲相識，在陳雲領導下以商人身份做中共地下交通和情報工作。1931年6月，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叛變，供出周恩來住處，幸而周已撤離，在陳雲的安排下，周恩來夫婦曾在楊琳開的文具煙酒店閣樓上居住。1935年夏，楊琳與陳雲、嚴樸等同船去蘇聯，又同坐一個火車包箱前往莫斯科，1938年他被陳雲派往香港為中共做資金調轉，採買物資的工作，1960年出任外經委副主任兼黨組書記。據作者稱，書中一部分內容是聽之於其父，有關遵義會議前後的那些內容，就是其父在橫跨西伯利亞的火車裏從陳雲、嚴樸處聽來的。到達莫斯科後，楊琳在共產國際中共黨史研究室工作，接觸過一些國際與中共中央的往來文件，還親眼看過第五次反圍剿期間，中央軍委召開的幾次會議給國際的報告。在筆者看來，更重

書中一部分內容明顯是吸取了學界研究成果，卻沒有為資料和觀點註以出處。整理者雖然作了說明，但如此這般將「回憶」與「研究」煮成一鍋，無形中就誤導讀者。

該書的來源還是有一定可信度，但是否是「信史」，還要看有無其他史料佐證。以這個標準看，該書部分章節既有來源，也得到其他資料的旁證。

要的是，在抗戰前期的武漢，主要就是1938年，當時楊琳為了押運物資並取回黃金，經常往返香港和武漢八路軍辦事處(長江局)，在中共代表團任職的博古是有機會和住在武漢辦事處的楊琳長談的。

向作者說「私房話」的第二個人是博古的好友潘漢年。作者說，他在1954年前多次去上海潘家，有關湘江之戰，遵義會議，周、博談話，博古和潘漢年的關係等，都是從潘漢年那兒聽來的。向作者說「私房話」的第三個人是嚴樸。在中共黨史上，嚴樸知名度不高，此人且於1949年革命勝利前夕病逝，其事迹就更少為人所知。嚴樸和博古同為無錫人，早年有交往，又和陳雲交厚，1935年春離開紅軍長征隊伍前去上海，再與楊琳等同船前往蘇聯遠東邊疆區轉去莫斯科匯報。作者說，有關中央蘇區、寧都會議、九月軍委會議、六屆五中全會等事，都是從嚴樸那兒聽到的。

和作者說得最多的還是其父楊琳，在文革中已知不久於世的特殊背景下，楊琳很有可能「放開」對其子說一些歷史上的舊事。當然，所有這些私下說話，在延安整風後都是犯忌的：其時，由毛與那些不了解蘇區歷史的筆桿子如陳伯達、胡喬木等共同創造的黨史解釋成為定論，毛已上升為神，加之不久全國革命勝利，毛的威望如日中天，了解內情的人早都噤口不語。可是這幾個人還是敢說，那都是有特別原因的。嚴樸敢說，是因為身體非常不好，可能不久於人世，聽的對象又是好友之後；楊琳敢說，是在文革中，又是對兒子說；潘漢年則情況特殊：按理說，經歷過長期黨內鬥爭而且曾遭打擊，又是情報工作

負責人的潘漢年，怎麼會對一個缺少閱歷的年輕人談那麼機密的黨史秘事？但照此書說法，毛早在1936年就對潘有成見了，那麼潘對毛也不會沒有看法。潘缺少軍隊和根據地生活的長期淬煉，對毛之新權威多有隔閡，私下對好友之後說一通，偶犯一些「自由主義」，也不是不可能。就是在那個時代，毛也不見得能把每個人的嘴都堵上。

由此分析，該書的來源還是有一定可信度，但是否是「信史」，還要看有無其他史料佐證，即需要查證作者所說的內容有無直接或間接證據，以及有沒有提供可資查詢的「說故事」的時間、地點、人物等。以這個標準看，該書部分章節既有來源，也得到其他資料的旁證。

例如：關於臨時中央財政非常困難，有賴於蘇區提供，但蘇區金錢支援中央也有限，就有俄國資料的旁證。1932年1月，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萊謝在給國際執委會國際聯絡部關於在華工作報告中提到，由於中共「經費困難，黨的活動嚴重癱瘓」。伊思美洛夫(張聞天)對萊謝說，1931年9月底或10月初，黨從蘇區收到1萬或1.3萬墨西哥元，自那以後，就沒錢了。張聞天要萊謝給中共弄錢，甚至提出應從在上海的蘇聯貿易組織那兒弄些錢。萊謝則要求中國同志「嚴加節約，以便渡過困難時期」，但是他得到的印象是中國同志「大手大腳花慣了錢，似乎他們根本不知道沒有錢」。為了幫中國同志「維持生計」，萊謝甚至從更加秘密的蘇聯軍事情報部門駐上海人員那兒「借了1,500元」，從另一個俄國在華機構的代表那兒「借了1,000元」^③。資料證明，臨時中央收到不少從莫斯科

科轉來的錢：1932年4月17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收到黃平（沃羅夫斯基）來信，說從1931年9月到年底，上海中央共收到共產國際1.03萬美元，1,000銀兩和1,000墨西哥元；1932年已收到2.5萬美元，包括3月5日收到的1.5萬美元^④。

1932年5月3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書記皮亞特尼茨基（Iosif Piatnitsky）發秘電給在上海的蘇軍情報機構在華人員佐爾格（Richard Sorge，大名鼎鼎的紅色間諜）：1931年12月至1932年1月，給他們轉去3萬美元轉給中共，皮亞特尼茨基查問他們收到多少，確切交給中共多少^⑤？然而，1932年3、4月後，中共中央的財經來源確已中斷。7月14日、24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給王明發電報，要求緊急匯錢，稱「財政狀況極其困難」，有四個月沒有收到國際的金錢援助，中央與蘇區的交通也中斷了，「蘇區本身需要經費，因此我們不可能得到蘇區的財政援助」^⑥，中共中央還說，前不久收到的1萬美元，都用來救牛蘭夫婦了，「我們一點兒也沒剩下」^⑦。由於上海的中共中央已「囊中空空」，7月25日，皮亞特尼茨基再發密電給在上海的佐爾格，要他把收到的2萬美元中的1萬元「立即轉給中國朋友」^⑧。以後，共產國際給中共金錢援助就採取更加多樣的方式，並採用「專項撥款」，1934年給中共確定的每月預算是7,400多美元^⑨。

關於「兩頂轎子」，也有重要旁證。最近披露的楊尚昆在1986年的回憶就提到「紅章縱隊」的問題。時任三軍團政委的楊尚昆說：前方的同志叫「紅章縱隊」為「混賬縱隊」，「前方有時候要等兩三天」才能等上中央縱隊，前方同志還責怪「紅章

縱隊」拖垮了部隊，造成湘江之戰的重大損失^⑩。

秦書中關於查田運動中毛的「左」，也有楊尚昆和劉英的旁證。楊認為毛領導的查田運動就是「左」的^⑪。劉英提到她在于都第二次擴紅，受毛的直接領導，毛的批語是誰反對擴紅的就殺。後來又來電說要三天找出反革命。於是縣保衛局就抓來一批人，硬說是「改組派」。後來洛甫來信，認為反對擴紅的不一定是反革命，才把這些人放了^⑫。

雖然該書的一些說法有旁證，但總的說來，它的許多提法和過去傳統說法出入極大而證據薄弱。例如：現有不少資料證實，博古中央要把毛留在蘇區，不帶毛突圍，只是因為蘇聯反對，才允許毛上路。2007年出版的俄羅斯檔案也說：遠東局「沒有支持中央蘇區要對毛澤東及其在江西的擁護者開展『公開批評』並要把毛澤東派到蘇聯去的意見」（第246號文件），而共產國際執委會也反對這樣做（第247號文件）^⑬。只是這份俄國資料沒有具體說明蘇區中央局「要把毛澤東派到蘇聯去」是在甚麼時候。從上下文看，似應是博古去蘇區不久反「羅明路線」那個階段，究竟真相如何，還有待新的證據的出現。

秦書中更有不少內容沒有提供具體時間、地點，例如：第七章「季黃冤案和西路軍」，作者說這是從方華（劉述芳）那兒聽到的，但此人是誰？結局怎樣？作者並沒有交代。有的內容雖是書中首次披露，例如黃超、李特被殺的詳情，不過，書中說張懷禮（原四方面軍總部參謀，後在迪化被安排為王明的副官）對李先念說是康生殺黃、李，可是張懷禮並不在現場，他何以知

雖然該書的一些說法有旁證，但總的說來，它的許多提法和過去傳統說法出入極大而證據薄弱。書中更有不少內容沒有提供具體時間、地點。

秦書對於博古和毛的合作說得很多。這是不是就因為毛是開國太祖，有意無意也想表揚博古的功勞？看來作者對毛太祖又敬又懼，還是不免要為先人在凌煙閣爭席位。

道？書中還說康生回到延安後向毛匯報此事，毛很滿意，那又有何證據？黃、李被殺是很大的事件，長久以來沒有細節證據，今天作者提出新說，就需要提出過硬的資料來源才能成為定案。

作者稱，他對「故事」做了整理，連貫，「查閱了大量黨史資料，核對日期」（〈前言〉，頁IV），這本來無可厚非，在口述史上也是需要的，但是過度整理，又會有加工之嫌，兩者如何掌握，確是難題。鑒於以上各點，目前似應把此書看為一家之言——有某種特定背景的一家之言。

三 此書的其他不足

博古被概念化或污名化數十年，此書作者為博古後人，意在為博古辯誣，他舉事實說明博古之書生氣及單純，使之與毛的老謀深沉形成對比，這大致可以成立。從這個角度看，該書可以說是「恢復了歷史原貌」。

毛熟讀中國古史，重視把政治上的勝負以史的形式明確敲定下來，他還喜歡叫政治鬥爭的失敗者參與寫史。例如：1944年，張聞天、博古都參與了〈歷史決議〉的寫作。1975年，毛又命鄧小平主持寫有關文革的歷史決議，被鄧婉拒。在延安整風期間和建國後，一些歷史當事者，被迫自打嘴巴，寫出自誣文字，這種壓力下的寫作，是權力意志下的書寫，在事過境遷後，由當事人或親屬寫出文字來澄清事實，是合情合理的。但親屬寫回憶錄也有不可避免的缺陷，這就是「為親者諱」的問題，即使一些寫得

不錯的回憶錄也有這個問題。那麼博古侄兒的這份兼有回憶和研究性質的文字是否也有類似的問題？這也是讀者不得不存疑之處。

但本書最大的缺點則在於完全沒有涉及延安整風時期博古被整的情況。該書雖然收入了博古在1943年所寫的〈我要說明的十個問題（提綱）〉，但是沒有提供博古在整風期間和中共七大上所作的檢討報告，而博古之弟楊琳是有可能了解其中一部分情況的，因為博古之妻張越霞當時就在延安，建國後兩家在北京還是有來往的。作者對博古在延安整風期間被整的情況有可能是真的不知，也可能是知而不提，但對於博古和毛的合作，卻說得很多。這是不是就因為毛是開國太祖，有意無意也想表揚博古的功勞？看來作者對毛太祖又敬又懼，還是不免要為先人在凌煙閣爭席位。

註釋

- ① 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編：《中國共產黨之透視》（台北：文星書店，1962），頁150。
- ② 朱玉主編：《李先念傳：1909-1949》（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頁312-13。
- ③④⑤⑥⑦⑧⑨⑩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3）——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31-1937）》（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頁91；145；149；186；190；190；191；20；20。
- ⑪⑫ 張培森整理：〈楊尚昆1986年談張聞天與毛澤東〉，《炎黃春秋》，2009年第3期，頁31；30-31；31。

高華 南京大學、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